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博士该不该到中小学任教

郭英剑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博士该不该到中小学去任教》。这当然是站在外人的角度,试图客观地去看和评价博士的选择。如果我把题目改为《博士要不要到中小学去任教》,则就是站在博士的角度,希望从他们的主观角度去看待这种人生选择了。其实,“要不要”和“该不该”确实是两个必需的视角。

高学历者任教中小学引热议

近段时间以来,深圳中小学高薪延揽高学历者前往任教的新闻,引起了媒体的热议与人们的关注。国内不少主流媒体都对此做了相关报道。这其中的观点在于——深圳30万年薪聘聘中小学教师,近九成是研究生。而这里的研究生,包括了博士研究生。

其实,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闻。据我所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早已不在少数。而在一些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具有名校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者前去应聘,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这次深圳30万年薪聘聘中小学教师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主要在于集团效应。据报道,今年9月,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发布消息称,区公办中小学面向海内外2020届应届毕业生招聘教师约400人。因给出近30万元年薪,该招聘信息引起人们的关注。10月2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招聘,龙华区教育局官方微博公众号“龙华教育”发文称,此次秋招“完美收官”,共吸引了超3.5万人报考,遍布11座城市21所大学的宣讲会会场爆满,来自全球的491名青年才俊入围,其中硕博研究生占比86.2%,博士23人。从院校分布来看,北京师范大学54人、北京大学48人、清华大学28人、中国人民大学15人。

应该说,类似的热议经常见诸报端,时不时会来一次。这类事件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一是因为高学历如博士者,如果他们到高校和研究机构去工作似乎顺理成章,但现在去了对学历要求并不太高的中小学,特别是连博士也名列其中,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二是高薪,不要说在中小学,看看现在高校中的教授与副教授的收入,能达到年薪30万者也并非多数,如此一来,30万的高收入引发热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我所知,在深圳今年已录取的人大15人中,就有我自己所带的硕士研究生,这自然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这样的热点也让我想到了美国类似的案例,其经验也值得说来给大家听一听。本文所说的高学历,主要指博士学位获得者。我个人以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小学任教属正常,但博士该不该到中小学任教,则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说的博士,主要指学术型而非职业型的

博士,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博士。事实上,无论中外,大都是学术型的、人文学科的(特别是公认为社会应用价值较小的专业)博士,才会遇到难以找到工作的困境,也才会出现高学历者到中小学任教的状况。而职业型或专业型博士,一般都会在博士毕业后走上职业化的发展道路——比如法律、外交、政治等领域的非学术型博士,大都会从事法律事务、从政做公务员,即便到高校也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不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这类博士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美国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并不罕见

在美国,博士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到中学任教,甚至有些教授选择从大学辞职,然后到中学去任教,这样的案例并不普遍,但也并非没有。

美国高校每年大约授予6万个博士学位。然而,高校中并没有如此多的教学科研岗位给这些毕业生。约5年前,美国有个统计称,大约只有41%的博士才能在高校找到长聘教授岗位。有些专业领域好找工作一些,有些则比较差。有报告称,2009—2010年间,美国大约有816名政治学博士毕业,其中49%的人找到了长聘岗位工作。这个比例算是高的,因为有些专业的博士找到工作的比例很低。那么,没有找到教学科研岗位的博士怎么办呢?很多人成为了作家、图书管理员、社会工作者等,当然,也有人到中小学去任教。

据5年前的一个统计,全美有博士学位者到公立中小学去任教者不到1%。但这种情况在私立中小学中就有所不同了。在美国的知乎(Quora)上有人询问,为什么常青藤盟校毕业生愿意到高中去任教。有人晒出了自己教师出身的清单:我的9年级拉丁语教师——哈佛;9年级英语教师——哥伦比亚;12年级英语教师——耶鲁……虽然这里并没有是博士,但确实有私立中学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12%。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早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刊登过一篇文章,讲到博士到私立学校任教的故事。阿拉巴马州著名的公立大学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有一位副教授沃茨尼亚克(Peter Wozniak)就选择离开自己的长聘教授岗位,转到当地的一所私立高中任教。此后不久,这位教授的两位同事也步其后尘到该校任教。

回看这些选择离开大学而到中小学去任教者的理由无外乎几种。首先,他们对现行的教育体制不满,学生厌学,教学质量普遍下降;其次,中学所开出的薪水远远高于他们在大学的收入,这一点甚至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再次,高校的教研压力,让一些不愿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选择逃离。当然,到中小学(特别是私立学校)任教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美国并不少见。

博士到中小学任教,事关教育公平吗

在由博士到中小学任教所引发的话题中,媒体谈论最多的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当然值得全民关注,但若认为博士到中小学任教会影响教育公平,我个人觉得理由并不充分。

因为高学历者到中小学去任教,毕竟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否则也不会成为新闻的热点。高学历者到诸如深圳这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去工作,从表面上看,会比其他地区中小学的师资资源更为强大,但就实际情况与教学效果来说,差异不会很明显。一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各级地方教育部门来说,调配与调控中小学师资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和平衡各地差异是大势所趋,尤其对地方教育部门来说,更是工作中的重点所在。二来,单就中小学的教学内容与实践来说,高学历或者是否名牌大学的博士,并不比其他教师占优,也不会产生特殊的差异,要知道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可能远胜一位新入职的高学历者。

高薪延揽人才之所以会引发热议,究其原因,还是教师工资待遇不尽如人意。其实,单就深圳地区而言,30万的年薪并不算高,如果不提深圳城市的吸引力,单是这样的薪水就吸引了来自北师大、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的研究生——当然,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因为这份所谓的高薪而去的话——那么,我们一点都不难想象其他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收入的实际情况是多么缺乏吸引力!

博士:“要不要”到中小学任教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博士该不该到中小学去任教》。这当然是站在外人的角度,试图客观地去看和评价博士的选择。如果我把题目改为《博士要不要到中小

学去任教》,则就是站在博士的角度,希望从他们的主观角度看待这种人生选择了。其实,“要不要”和“该不该”确实是我们看待这类问题的两个必需视角。

从博士“要不要”去中小学任教的角度看,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需要加以考虑。

首先,博士是否自觉自愿去。如果一位博士自觉自愿到中小学任教,那么,无论出自何种原因,一切都应取决于博士个人。如此一来,无论外人有多么正当的理由,都不能干涉博士个人选择的自由。其次,博士的选择很多时候与所学专业有关,对于专业限定所造成的择业定向性困难,人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比如,人文学科的博士较难拿到令博士满意的工作合同。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11月17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该院著名院友、教育家俞敏洪先生在典礼上做演讲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自己到缅甸去考察,应邀到我国驻该国大使馆去演讲;当时他询问听众:有没有来自北大的。其中有七八人举手,他很惊讶,说这么个小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北大人?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学的都是缅甸语,去了其他地方。当然,这可能是个玩笑,但也说明了所学专业可能影响人的就业方向。

虽说从博士的个人角度来看,“要不要”只是个人问题,但站在外人角度,“该不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博士:“该不该”到中小学任教

在对博士到中小学去任教的热点讨论中,我注意到一个最被人忽视或者未见到有人讨论的问题是:博士到中小学任教,能发挥他们的学术水平吗?在美国知乎(Quora)上,也有人直言不讳地提问:博士到高中任教浪费了么(Is it a waste for a PhD to teach high school)?

我们都知道,一位博士在中国的诞生,一般是要经过从大学到硕士再到博士少则十年多则十余年的学术训练才能出炉的。就此而言,一位博士毕业,单就其所受的学术训练而言,走上学术道路,发挥专业特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也名正言顺。反过来讲,对于学术型博士来说,如果未来不从事学术研究(这里是一种广义意义上的推论,而不是狭隘的

理解。只要从事与任何学术研究相关的工作,哪怕与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相同,也不能算是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那么对于他所经历的常年的专业学术训练来说,实在殊为可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是一种资源浪费。

当然,可能没有会有人说,中小学特别是中学怎么就用不到学术研究呢?博士在这里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啊!这我自然相信。但我想举个反例:如果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教师都是本科或者硕士,以这样的学历为主的教师队伍就可以很好地完成国家与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责任,那么这就基本可以证明,对于中小学教育由他们这样的知识储备者(当然他们也要在工作中进行进一步学习)就可以胜任了。

如果这一论断正确,我们其实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博士来说,中小学教育很难真正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不是不能,而是中小学教育的内容与实践可能并不需要。

说到博士到中学任教,我这里有一个实际案例。上世纪末,一位我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的同学,博士毕业之后先到了上海一家名校工作,但因为当时所在高校无法解决其夫人和孩子的户口问题,转而到了一家中学。这所中学不仅可以解决他夫人和孩子的户口问题,还提供住房等优惠条件,当然,中学的工资也远远高于他之前所在的高校。但他后来跟我说,当初,他绝不是冲着这高工资而去的,只是想“曲线救国”。等到合同期满,他选择了合理合法地离开。他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中学没有学术环境,以教学为主。因此,他再次回到了大学。不久就升任了正教授,还担任了所在高校一所学院的院长。在新的岗位上,他事业风生水起,尽情地发挥着才华。

当然,任何个案都很难说明一个普遍的道理。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如果一位博士心怀学术的初心,那么,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打算”,最终还是回到学术道路上来。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像我这位朋友那样因为其出众的才华与合适的岗位而迅速返回到学术道路上阔步前行,这样的案例真不多见。人生的道路一旦走岔,要想拐回来其实很难很难。

我这里并不是反对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只是提醒博士要慎重选择,社会各界要更加清醒并理智地看待这一现象。

全球气候危机中的高校应对力

斯蒂芬·斯特林 斯蒂芬·马丁

大多数大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如今世界面对的问题已经在改变。在过去的近100年中,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培养人才、为未来做准备,以应对战争、经济、社会的剧变。然而,如今的状况却发生了变化。

目前,我们处于人类世(此前由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发表于《自然》),认可地球已进入新的地质时代,该新的地质时代被称作“人类世”。就必须赢得一个安全和宜居的未来,而不是假设拥有一个安全、宜居的未来。如果人类接受当前环境发出的警告,那么留给人类赢得美好未来的时间就不多了。

最近,发表在《生物科学》上的一份相关报告首次使用了“紧急状况”一词,并由11000名科学家联名签署,明确证实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他们指出“为了确保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

报告警告道,如果不对影响气候变化的活动作出深刻而持久的改变,那么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灾难。报告呼吁,“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必须发生转变”。这同样为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

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不论生活得幸福安逸与否,如果人类要在本世纪生存,并消除全球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变,尤其是目前加剧危机的大量人类活动和行为须迅速转变。

尽管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自身应对气候紧急情况的滞后性,导致高等教育相应政策和实践反应的迟缓,但是我们要意识到,高等教育在追求和塑造价值观、知识、技能和研究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而这些对于社会向低碳转变和确保赢得安全的未来,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未来几年,大学所独有的知识、智慧、创新和资源如何配置,将对上述转型的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

最近,《泰晤士高等教育》发表了一封由1000多名学者和主要评论员签署的公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领域关注、试图解决的问题,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时候把对于排名和教学卓越框架的纠结和牢骚放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了。

开信,呼吁各大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迅速、独立地采取行动”,国际上已有7000多所大学签署了这封气候紧急信函。

这些举措无疑是重要的,并且也很受大学欢迎,但从其背后仍能看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大学在应对全球气候紧急状况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研究显示,91%的学生关注气候变化。可见,学生对于应对全球气候紧急状况的意识是有的,而高校是否适时提供相对应的

教育、教学以及研究是助推的关键。

上周,英国大学和学院环境协会、英国高校联合会等联合为英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领导人发起了新的气候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12个月内收集材料,并打算在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2020年12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提交报告。

据悉,该报告将侧重于制定目标和提出合作倡议,作为两个部门的可交付成果。其高级管理团队被敦促利用其独特的地位、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致力于采取行动以推动变革。鉴于时间所剩不多,人们希望在高等教育中已经存在的关于气候可持续性的国际性文献和实践成果(尽管很多经常被边缘化)能够在委员会报告前被装订整理出来。

然而,参加气候委员会高层会议的大学数量少得令人失望,因此,我们提出了大学的“应对能力”问题。也就是说,鉴于目前的政策、结构和优先事项等的影响,大学是否拥有应对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的能力。

科研、教学卓越框架、竞争性排行榜、学生和工作人员留用等都是如今高校通常关注的问题,而现在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将经济和社会福利目标纳入其中,与地球的存亡联系起来,付诸行动,我们还有时间做出调整和改变。

但大学是否正确解读了时代的信号?高校是否有能力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中担当起学习型组织的责任、做出根本性调整?

今年2月,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是一场危机:面临环境崩溃的时代》。报告指出,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继承”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除了少数杰出的院校和优秀人才,整个高等教育界还需要多久才能够“正视”这一新的紧迫现实?这无疑需要整个系统文化的转变和高等教育焕发新生命。

(作者系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西英格兰大学,许悦编译)

域外传真

“我不能冒险再失去一个(学生)。”在大学夏末的一天,校园里充满了对新学年的期待,而一位名为安娜的学者却焦虑地说。

安娜穿着一件花衬衫,是个温暖、亲切的人。她正在为一位学生感到忧愁并决定亲自送他前往医院急诊室。“如果他中途出事了怎么办?这份自责感直到我生命结束也不会消失。”

这使她回想起另一名女生,那名学生在一个周六晚上给她发了一封产生自杀想法的邮件。“我花了几个小时和这名女生以及她的朋友通电话。直到我确定她的朋友会带她去医院急诊。”几年前,因为自杀,安娜就失去了一名学生,学生的死亡使她和她的同事们更加焦虑。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上寻求导师的帮助。很自然的,像安娜这样的导师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支持这些学生。然而,当他们谈到一个最近死于自杀的学生时,常常会有无助的感觉。某所大学的社会科学教师“山姆”就经历过那种无助。

“即使你已经在尽力帮助别人,”他解释道,“你也总会想,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山姆表示,让他最为头疼的是“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数量太多”,他指出,即使“只是坐下来和那些经历过非常艰难时期的人交谈,也会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学生们也往往不确定导师会花多少时间来照顾他们。例如,尼亚姆在大学最后一年时,同为学生的哥哥自杀,失去了哥哥的她下定决心完成这一学年,并报名参加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在尼亚姆的哥哥去世的几个星期后,有一次她哭着和母亲通电话。几个小时后,她在一家咖啡店外碰见了她的导师。尼亚姆一年后才发现,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邂逅。她母亲在她哭过后,给她的导

师发了一封内容为“她近期比较忧郁”的电子邮件,随后导师花了近一个小时在校园里到处找她。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学生患上焦虑或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自杀率也因此不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3自杀的学生,大学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在其自杀前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承受煎熬。而当时他们接触得最多的成年人很可能是那些教他们的人。

作为学生个人导师、课程组织者和讲师,他们定期与学生见面,并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成为他们第一个可停靠的港湾。然而,学者不是专业心理顾问,而且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如何正确、有效支持这些学生的培训。许多人也在为自己工作生活中的问题、烦恼而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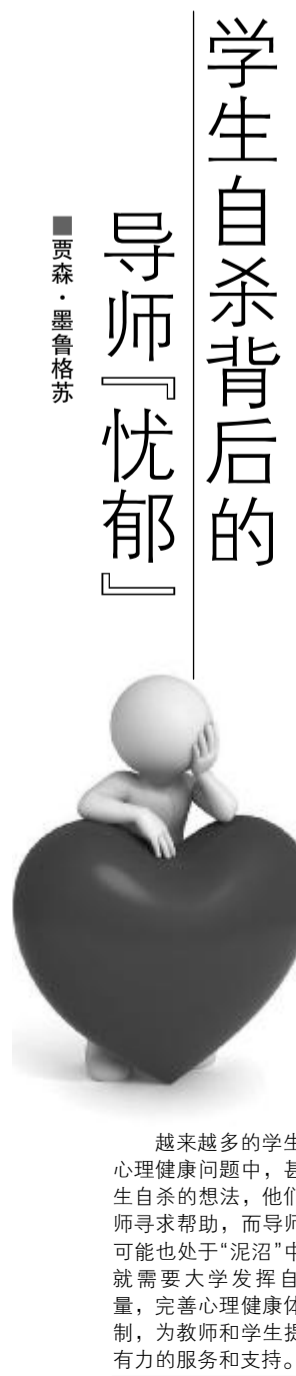
指望导师进行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控和咨询,大学的支持力度是否足够?对安娜来说,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在她的学生自杀去世后,她曾多次给管理层发邮件,建议为自杀学生所在年级的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这已经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了,而大学的回答是,询问班上谁最需要咨询。

学校经常对导师强调,告诉学生如果遇到心理问题有哪些选择,以及如何得到帮助,然而这不要求教师自身提供这样专业的帮助。

总体来看,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往往是非专业导师提供帮助,而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专家。这样的体系不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来说,都是不到位的。这就需要大学发挥自身力量,完善心理健康体制机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撑。

(作者系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许悦编译)



学生自杀背后的导师『忧郁』

贾森·墨鲁格芬

越来越多的学生陷入心理健康问题中,甚至产生自杀的想法,他们向导师寻求帮助,而导师自身可能也处于“泥沼”中。这就需要大学发挥自身力量,完善心理健康体制机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撑。